

蒙元服饰研究综述

苏日娜

(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北京 100081)

摘 要: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到忽必烈称帝建立大一统的元王朝,简称为蒙元帝国。蒙元服饰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极富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蒙元服饰;多元文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7)03-0099-07

蒙古民族于12世纪末崛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统一蒙古高原诸部落,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亚洲以及欧洲的广大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进而统一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的元王朝。《元史·地理志》记载:“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大理),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到忽必烈称帝建立大一统的元王朝,简称为蒙元帝国。

蒙元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随着几次大规模的西征,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大量东迁,经由河西走廊陆续进入中原。他们中有畏兀儿人、哈刺鲁人、钦察人、康里人,中亚的突厥人、波斯人和西亚的阿拉伯人等,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民族得以诞生。在如此辽阔的疆域土地上,几十个民族杂处混居在一起,奠定了今天多民族共存的局面。这些民族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各自的语言文字,当时使用的文字

就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多达六种。在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各民族通过商业活动、互通婚姻、部族迁徙等活动,相互之间进行着文化适应,各自吸收着异质的文化因子,形成各民族文化大交汇、大融合的空前局面。沉静已久的丝绸之路再度繁荣,海上丝绸之路有了长足的发展,使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使中国放眼于世界。蒙元帝国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以及伸向南海、印度洋的远洋航线,打通了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联系交通。使许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俗的民族,从此有了频繁的往来和广泛的交流。正如元史学家韩儒林所言:“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大批欧洲和阿拉伯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蒙元时期的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收稿日期:2007-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蒙元服饰与东西方文化交融》(项目批准号 05JA850009)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苏日娜(1959-),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民俗学研究。

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这是蒙元帝国对人类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蒙元帝国使草原文明、欧洲文明和东方文明相互交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元文化。作为蒙元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元服饰,其服饰在面料、形制、种类以及服饰的装饰诸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特别是蒙古族的“罽罽冠”和“质孙服”独树一帜,成为蒙元服饰的代表;而源于西域的“纳石失”,其织造工艺水平更是大大超过了西域。蒙元服饰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极富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对蒙元时期服饰研究进行一次梳理,以求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20 世纪 80、90 年代蒙元服饰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前,国内学界对社会生活史(包括民俗史)重视不够,研究较为薄弱。钟敬文先生曾经说过:“过去一般历史学家的注重点,多放在对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生活、文化的记述和评论上。作为各时期基层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历史,在他们的史书上几乎是一块没字碑。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和人文科学著作(包括心理学等),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和阐述也是很稀少的。”^[12]至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虽然蒙元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俗史所呈现出的活的形态。蒙元服饰以她雍容华贵、绚丽多姿的风采为世人所称赞,以其独特的形制和精湛的工艺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服饰宝库之林。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只做过一些浅显介绍,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80、90 年代陆续出现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依据史料记载对证考古文物资料对蒙元时期的服饰进行一些表象描述,或用史学研究方法对服饰的词义进行一些考据,或进行一些一般性的研究,专题性研究尚未走向深入。这个时期蒙元服饰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集中于文物考古资料研究

80、90 年代蒙元服饰研究多集中于对考古文物的描述与考证上。可喜的是 20 世纪在国内外发现了一大批有关蒙元服饰的窖藏丝织品、服饰

实物和壁画等考古文物。这些珍贵资料的发现为蒙元服饰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立体的、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这些考古文物、壁画、图像资料及研究归纳如下:

(1) 实物。蒙元早期的丝织品主要有北京寿庆寺海云和尚墓中发现的织金织物、缂丝、刺绣和罗帽。关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出土的丝织品,夏荷秀、赵丰在《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地出土的丝织品》中,详细介绍了该地出土的一件蒙古汗国时期的织金锦辫线袍。该织金锦辫线袍呈黄褐色,右衽交领,窄袖口,束腰。衣料上乘、做工精细。袍长 142 厘米、两袖通长 246 厘米、袖口 14 厘米、下摆宽 16.5 厘米,腰部有宽 16.5 厘米、围长 96 厘米的钉线绣(形似细条绒)的束腰。右腰部位有对扎绊。主要面料采用方胜联珠宝花织金锦。在右衽底襟和左下摆夹层处及两个袖口采用团窠头戴王冠的人面狮身锦。图案外形为规矩方格形,方格中是一个团窠,窠中有一对左右对称的头戴王冠的带翼人面狮身像图案。人的面部表情略显儿童稚气,毫无狮子的凶猛之像。两狮回首顾盼,眼神十分传神。该图案不仅反映出当时织金锦的织造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可以了解到带翼人面狮身图案恰好与中亚公元 10—12 世纪之间的丝织品的图案纹样相似^[3]。夏荷秀、赵丰的《镶黄旗哈沙图古墓出土的丝织品》一文,就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格都勿拉苏木哈沙图嘎查发现的金元时期蒙古汪古部墓葬出土的丝织品进行了研究,指出罗织物是金元时期相当流行的面料,其制造技术独具特点。金元之际蒙古族喜尚用金,其印金技术已相当成熟^[4]。潘行荣的遗作《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窖藏丝织物及其它》^[5],对在元代集宁路故城发现的窖藏丝织品逐一进行了考证和介绍,其中的提花织锦双羊图案被面、绣花夹衫、印金夹衫成为日后研究蒙元服饰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新疆乌鲁木齐盐湖一号古墓出土的丝织品^[6]、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王墓梁元代汪古部贵族陵园出土的罽罽冠^[7]、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8]、内蒙古元代集宁路遗址窖藏丝织品^[9]、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的窖藏丝织品^[10]、山东邹县李裕庵墓^[11]、河北沽源萧氏梳妆楼、甘肃敦煌莫高窟洞窟藏丝织品等,学术界也给予了

介绍和研究。

(2)壁画。蒙元时期壁画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阶级关系、风俗习惯,而且较真实地再现了蒙元服饰的风貌。主要有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代壁画对坐图^[12],男墓主头戴圆顶帽,帽缨垂肩,耳后宽扁带上有缨饰。身穿右衽窄袖蓝长袍,腰围玉带,脚穿高靴。女墓主盘髻插簪,耳垂翠环。身穿左衽紫色长袍,外罩深蓝色开襟短衫,腰间系带垂至膝下,脚穿靴。男仆头戴圆顶帽,扁圆状帽缨,耳后亦有垂带饰。身着窄袖右衽红长袍,腰间围带,右侧挂一扁圆形荷包。女仆梳双丫髻,髻上扎红带,身着窄袖左衽粉红袍,外罩开襟短衫,脚穿浅口平底鞋,直观勾画出蒙元时代人物的装扮。内蒙古昭盟赤峰三眼井的元代壁画,以2号墓壁画的保存最为完整,以主题画《宴饮图》^[13]中人物服饰为代表,男女主人,平坐宴饮,男主人居左,头戴尖顶宽沿帽,上饰朱红帽缨,脑后垂巾,身着盘领紧袖长衣。女主人居右,头裹皂纱笼髻如巾状,身着宽袖袍罩开襟长衫,领沿饰花,中单盘领。两侍女头上笼髻,上饰红花,身着盘领长衫。一男侍头戴圆顶宽沿帽,后沿垂带,身着盘领窄袖长袍,腰似束带,脚穿长靴。壁画中的服饰衣着为我们探索蒙元时期蒙古族的服饰制度及其历史演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考古资料。反映蒙元时期服饰文化的壁画还有敦煌元代壁画、敦煌石窟壁画,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壁画童子伺茶图,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元墓壁画后宫奉食图,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元墓壁画戏曲表演图,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元墓壁画祈雨图,山西运城元墓壁画杂剧图,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献酒图,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夫妇对坐图,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中的乐舞图,辽宁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探病图、宴饮图^[14],山西芮城永乐宫元墓壁画朝元图,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元代壁画,等等。对于以上壁画的研究仅局限于一般性的描述、考证上。

(3)石像。从一些石像、石刻人物方面亦能直观地了解当时服饰的情况,先后发现的有蒙古国草原保留的公元13—14世纪的石人雕像,在蒙古国苏赫巴托省达力甘加地区,发现石雕人像53座,其中17座仪态举止不明,余下34座均呈坐椅式,右手握器皿于胸前,左手自然扶膝或椅手,腰部一般无带饰。此类石雕像刻画的面部表情庄严

生动、服饰特征细致鲜明^[15]。前苏联学者卡扎克维奇在蒙古达里甘加地区也发现了“坐在椅子上的石人”。石像的头饰、衣饰靴子和发式似13至14世纪蒙古人的衣饰和发式,与绘画中所描写的蒙古人肖像极其相似。这些石雕的某些部分彼此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身体各部分的比例雕刻得十分恰当,令人惊讶^[16]。在内蒙古正兰旗羊群庙祭祀遗址,出土了三座大型汉白玉石雕人坐像^[17]。陈永志的《羊群庙元代石雕人像装饰考》^[18]利用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土的3座汉白玉石雕人像实物,对元代的发式、服装、纹饰等进行了论述。另有山西晋城玉皇庙元代二十八宿塑像、元砖雕人物,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刘爱宝、张德文在《陕西宝鸡元墓》^[19]报告中,展示了1980年在陕西省宝鸡古墓发现的8件陶俑,其中武士俑6件,女侍俑1件,男侍俑1件,武士俑头戴钹笠帽,顶有缨,发式为“婆焦式”,身穿交领右衽窄袖短袍,下摆不过膝,腰束巾,下身穿裤,膝部有护膝,足穿系带圆头靴。男侍俑、女侍俑穿着打扮亦同武士俑。只是女侍俑外罩对襟短衣。

(4)绘画。蒙元时期的绘画更能逼真、形象地展现当时的服饰习俗。主要有南薰殿旧藏本《元朝历代帝王帝后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赵孟頫的鞍马人物系列画《秋郊饮马图》、《浴马图》、《人骑马图》、《调良图》及《斗茶图》,佚名的《射雁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贡马圈》、《佛朗国献马图》,元刻本《事林广记》中的大量插图,《饮膳正要》中的插图等。国外大量13—14世纪的波斯彩绘极其珍贵。对于这些绘画资料,从服饰角度给予研究的甚少。

2. 多于词义考释

金启裕教授、方龄贵教授是对蒙元服饰进行研究较早的学者。在《故姑考》^[20]一文中,金教授就罽罽冠的产生、消亡进行了细致的考述。方龄贵教授的《罽罽考述》^[21]则从罽罽冠的词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另据方教授的文章得知,20世

见拙文《蒙元时期蒙古族的发式与帽冠——蒙元时期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蒙元时期蒙古人的发型概括为“婆焦”即“髻顶垂髻髻”式。“婆焦”式又细分作两种:一种是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于额前,把其他留下的头发分左右编成小辫子折成髻垂在两肩上,垂髻辫子的数目不等,有两条、三条或更多。另一种是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不留当前发,把其他留下的头发分左右编成小辫子折成髻垂在两肩上,垂髻辫子的数目不等。

纪二三十年代曾有姚从吾先生的《说叶刊元朝秘史中的固顾冠》,吴晓玲先生的《说罽罽》、《说罽罽补》,但后两文均已佚失。法国嘉特麦尔译注、拉施都丁的《波斯蒙古汗国》,曾就李黑塔的语义进行了论述。希莱格的《亚洲、中国及欧洲的圆锥形女式高帽》一文,就罽罽冠与其他民族的高帽进行了比较。布勒士奈德的《东亚史料中所见的中世纪寻究》在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时,于“姑姑”一词注疏中引其他史料对罽罽冠进行了注释。另外,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高丽史中所见的蒙古语之解释》,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李黑塔”考》,江上波夫的《蒙古女帽罽罽考》,冈本敬二的《关于亚细亚北方诸民族妇人帽“李黑塔”》等都不同程度地就罽罽冠的词义和源流进行了考证。

关于“质孙”服,专门的研究成果很少见到。仅在研究“诈马”宴的文章中有所涉及。例如,韩儒林先生在《元代诈马宴新探》^[22]一文中对质孙服的“质孙”一词的词义作了考证,认为“质孙”另称为“诈马”,“诈马”一词来自波斯语“Jamah”,意思是衣服。“质孙”和“诈马”说的是一回事,都突出了宴会上服装的变化和奢华。

3. 侧重于一般性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社会生活史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新视角、新热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研究开始为人们所重视。有关蒙元服饰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但只是停留在一般描述层面上的介绍,专题性的、多角度的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有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蒙汉文合璧《蒙古民族服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史卫民教授撰写的《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者为一般性的民族服饰图鉴介绍,对蒙元时期的服饰只是在追溯服饰历史发展脉络时做简单介绍。后者是对元代社会生活整体的历史概述,服饰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没有作具体详实的研究。在国内服饰研究方面比较权威的当属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先生历半生精力,广泛接触了实物、图像、壁画、墓俑,采用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中国历代服饰,贡献颇大。然而,就元代部分则主要是从中国断代服饰史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较多地论述了元代汉族的服饰,没有突出蒙古族服饰的特点,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另一部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因周先生擅长绘画,所以书中配以大量图画,对中国历代服饰进行了形象、具体的描述。还有李肖冰的《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版),赵芳志主编的《草原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版),黄能馥、陈娟娟、钟漫天的《中国服饰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涉及到蒙元服饰的内容。

不能忽视的是,相关的一些北方民族服饰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李逸友的《论内蒙古文物考古》、《略论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乌桓和鲜卑》、《契丹的髡发习俗》、《左衽小考——关于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左衽》,张国庆的《辽代契丹人的髡发习俗考述》、《辽代契丹服饰考略》、《辽代契丹人的冠帽、鞋靴与佩饰考述》,武玉环的《略论辽代契丹人的衣食住行》,张久和的《室韦的习俗述论》,赵斌的《乌丸帽考》,赵评春的《金代女真服饰研究》,郭殿忱的《女真服饰史论》等不同程度地对乌桓、鲜卑、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服饰及生活习俗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二、21世纪初蒙元服饰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研究方法上,蒙元服饰研究均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蒙元帝国特殊的历史地位,蒙元文化开始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各种蒙元文化研究会、基金会竞相成立;一些蒙元时期的历史遗迹正在开发和修缮中,如北京元大都公园的开放、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的恢复、内蒙古锡林郭勒市元上都博物馆的筹备建设、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的设计规划,等等。特别是2006年正值蒙古汗国成立800周年之际,国内外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各种蒙元文化展览、宣传和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使世界进一步了解到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创建的蒙元帝国这段改变了世界格局的辉煌历史。同时解读到融合了多种文化因子的蒙元服饰不仅在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能够直接推动当今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伴随着蒙元文化热的兴起,蒙元服饰、艺术研究不断有人问津。该时期蒙元服饰的研究特点,主要概括为两点:

1. 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

开阔的视角及专业技术的运用,拓宽了蒙元服饰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我国著名丝绸史专家、东华大学教授赵丰先生多年从事纺织考古的艺术史和技术史研究,著述颇丰。其代表作《中国丝绸史》是作者运用科学的分析手段与历史文献相佐证的研究方法,凭借其扎实的丝绸专业知识结构,依据考古中发现的中国古代丝绸文物,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历代丝绸的特点;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丝绸的生产技术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书中对蒙元丝绸的生产技术、丝织品种、色彩运用、图案设计、民俗寓意等进行了详细、精准的介绍。在丝织品种中介绍到元代的织御容:“随着缂丝技术的进步,皇帝的御容不仅用绘画来记录,还用缂丝来织制,织御容是蒙元特有的御容制作方式,其出现体现了蒙古族对丝绸的热衷,元代《花塑记》中记载了当时摹织蒙古皇帝御容的史实。蒙元时织御容以绘御容为粉本,尼泊尔人阿尼哥是已知制作织御容的第一人。但目前传世真正的缂丝御容只有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缂丝蔓脱罗裳的元文宗和元明宗帝后像。”^[23]

研究蒙元服饰必须提到两部重要史料《老乞大》和《朴通事》。这是两部高丽时期记录中国语言的教材,近年来有多种版本及对各种版本的研究和解释。主要版本有汪维晖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书》,该教材提到的绸缎料图案有:界地云、宝相花、四季花、缠枝牡丹、骨朵云、西番莲、四云、笔管花、穿花凤、海马、天花镶八宝、蜂赶梅等纹样。《老乞大》中还提到许多织物的名称,其中提到一种胸背。胸背指的是在胸前背后织出的一大块方形图案,后称补子,二者有区别,胸背是直接织在织物上的,补子是先织好然后补到衣服上的。如,鸦青胸背、鸦青金胸被、象牙底儿胸背等。关于胸背,赵丰先生有独特的观点。他在《蒙元胸背及其源流》一文中对蒙元时期的胸背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现存于世的蒙元时期的胸背有十余件之多,其织造工艺主要采用状金(包括状花),少部分采用销金印花(即印金)工艺,极少采用刺绣工艺。将胸背或直接制成面料,或后印和绣在衣服上。衣服的形制不限,窄袖长袍、短袖答护、海青衣和比甲皆可用胸背。胸背图案约为30厘米左右的正方形,内容包括龙、凤、麒麟、松

鹿、梅鹊等装饰性题材,无等级的象征意义。胸背通常以金色为主,其他部分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一衣一色,形成一色衣,应该属质孙服之一种。胸背的产地很广泛,北方的陕西,江南的苏州、镇江和宁波都生产过胸背。作者认为蒙元胸背源于金代,流行于蒙元,并传入西亚,对西亚的服饰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又为明朝所继承,在结合了汉族礼制中用服饰上的鸟兽代表官阶的传统后,形成了象征官员等级的胸背,即后来的补子^[24]。赵丰对元代服饰上常出现的纹饰作出了解释:“元代的云纹中多出现如意头的形状,这其实是灵芝云的一种发展。但由于它将如意头和云气连接起来,便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云纹。如山东邹县的云纹杂宝缎和江苏苏州的云龙八宝缎,其主要形状是若干如意云头(有时有二合、三合的情况),由若干带状云连接起来,连接后的形状不固定,随图案需要而变化。这种云纹不仅传入高丽时代的韩国,还一直流行到明代初期,并被正式称为骨朵云。”^[2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扬之水先生,利用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二件刺绣品与文献记载,撰文论述了“满池娇”的源流。认为满池娇是元代中期以后刺绣中的一个常见题材,多见于时人题咏,如柯九思的《宫词》:“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苔。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注云:“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25]张煜《宫词》:“鸳鸯鸂(刺鸟)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著御大明朝。”^[25]张翥有《江神子·枕顶》一阙:“合欢花样满池娇,用心描。数鍼挑。面面芙蕖,闲叶映兰苕。刺到鸳鸯双比翼,应想象,为魂销。巧盘金缕缀倡条,隐红绡。翠妖娆。白玉函边,几度坠鸾翘。汗粉啼红容易洩,须爱惜,可怜霄。”^[26]鸽子洞元代窖藏的几件刺绣枕顶中,其中一件刺绣花样同词人描写的大致相似。构成满池娇图案的两个基本要素,即荷花与鸳鸯,它经过不断传承和演变而成为基本要素不变的固定要素^[27]。

欧阳琦撰文《元代服装小考》,则从另一个角度认为:“谈及元代服装史,首先需抛弃民族成见。我们不得不承认,蒙古铁骑戎马的统治者们,在这块汉族人繁衍发展的土地上创造了丰功伟绩。元

朝融合了地域内的汉族和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蒙古人、色目人等各大少数民族,其帝国贯通亚欧,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体现在服装上,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28] 格日勒图则从审美观念方面讨论了《蒙古族传统图形及审美特征》,指出蒙古族传统图形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蒙古民族思想情感、精神风貌的视觉艺术形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和累积下来的传统造型艺术宝库^[29]。

另外,清华大学尚刚教授的专著《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以多维的视角审视了元代的工艺美术,指出元代的工艺美术是多种文化大交融的结晶,蒙古族文化、汉族传统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对工艺美术影响深刻。蒙古族尚青、白颜色的审美观念,崇“七”、“九”数字的风俗习惯,在工艺美术中发挥出特殊的作用,如丝、毛制品,青花瓷等。而伊斯兰工艺制作的精细考究、装饰繁缛使工艺美术深受影响,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图案、精湛技术、更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多种文化大交流的时代玉成了元代工艺美术。

2. 专题研究纵向深入

专题性研究不断深入。赵丰最近发表《蒙元龙袍的类型及地位》^[30]一文,指出蒙元时期是中国龙袍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依据龙纹装饰类型的不同,蒙元龙袍大致分为云肩式龙袍、胸背式龙袍、团窠式龙袍三种类型,并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金琳的《云肩在蒙元服饰中的运用》^[31]一文,依据史料记载、图像资料,结合中外现存的云肩实物,对蒙元时期云肩的纹样特征、生产技术、服装类型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指出云肩出现于金代,风靡于蒙元时期,蒙元时期的云肩主要采用的工艺是织和缂,缂丝工艺最多且缂丝云肩纹样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在云肩装饰上大量采用以金线显示花纹的手法,使织金云肩颇为盛行。蒙元时期的云肩褙袍到明代已正式定型为封建帝王标示身份的云肩龙袍。贾玺增的《罽罽冠形制特征及演变考》^[32],较全面地对罽罽冠进行了一次梳理,文中展示的民间私人收藏的罽罽冠图像非常珍贵,文中所绘制的罽罽冠不同时期的形制图亦有参考价值。另外,崔圭顺的《〈元世祖出猎图〉所绘世祖服饰考》、郑巨欣的《黄金和元代丝绸印花》、王业宏的

《蒙元女装的基本类型及穿著方式》、金琳的《浅议蒙元辨线袄的制作工艺》、罗群的《元代纹锦被面的组织特色和织造工艺》、楼淑琦的《元代服饰工艺及其修复的介绍》、朴文英的《元代缂丝研究》、林健的《漳县元汪氏家族出土冠幅新探》、孙慧君的《隆化鸽子洞出土两件元代织绣饰物定名初探》、俄罗斯学者 Zvezdana Dode 的《从 Ulus Djurchi 出土黄金部落宝藏谈蒙古时期丝绸装饰中的中国、伊朗和中亚艺术传统的鉴别》、韩国学者金文淑的《十三至十四世纪高丽时期服装中所使用的蒙古服装》、徐祯婉的《14—18 世纪 老乞大 服装术语的比较研究》、安人实的《高丽时期的男袍复原——以 13 世纪腰线贴里和搭护为例》、李宣谔、沈莲玉的《高丽时期佛腹藏中出土的服饰和纺织品》等研究成果分别从各个专题深入讨论了蒙元时期的服饰,为我们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三、结 语

一部草原文明史既是一部草原民族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民族互相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更是多种文明在草原地区激荡、锤炼、最终迸发出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的历史。而鲜明的蒙元服饰文化就是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中亚、南亚文化交融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世界性,既丰富了中华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研究蒙元服饰,不仅能够了解蒙古族服饰的发展变化规律,窥见蒙古族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能够发现各民族文化相互间的影响与交融,为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对于我们改革开放后及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文化整合具有借鉴作用;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繁荣和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可以为民族学、影视、戏剧、歌舞、美术、服装、博物馆等部门提供原生态的服饰资料。我们期待蒙元服饰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参考文献:

- [1] 宋濂. 元史·地理志:卷 58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6:345.

赵丰、尚刚主编《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艺纱堂出版社,2005。

- [2]钟敬文. 民俗学与民间文学[C]//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82.
- [3]夏荷秀,赵丰.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明水乡出土的丝织品[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
- [4]夏荷秀. 镶黄旗哈沙图古墓出土的丝织品[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121—123.
- [5]潘行荣. 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窑藏丝织物及其它[J]. 文物,1979,(8):32.
- [6]王炳华. 盐湖古墓[J]. 文物,1973,(10).
- [7]盖山林. 阴山汪古[M]. 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1991.
- [8]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J]. 文物,1982,(2).
- [9]李逸友. 谈元集宁路遗址出土的丝织品[J]. 文物,1979,(8).
- [10]隆化博物馆. 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窑藏[J]. 文物,2004,(5):4-25.
- [11]王轩. 李裕庵墓中的几件刺绣衣物[J]. 文物,1978,(4).
- [12]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代壁画墓[J]. 文物,1983,(4).
- [13]项春松,王建国. 内蒙古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J]. 文物,1982,(1).
- [14]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 凌源富家屯元墓[J]. 文物,1985,(6).
- [15][蒙古]巴雅尔. 东蒙古石人研究、蒙古的古代文化[J],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2,(3).
- [16]卡扎克维奇. 达里甘加地区墓葬上的石雕像[J]. 列宁格勒,1930,转引自阿木尔巴图. 蒙古族美术研究[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245.
- [17]魏坚,张永志. 正蓝旗羊群庙石雕像研究[C]//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考古文集:第1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622.
- [18]陈永志. 羊群庙元代石雕人像装饰[J].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5):19—23.
- [19]刘爱宝,张德文. 陕西宝鸡元墓[J]. 文物,1992,(2).
- [20]金启琮. 故姑考[J].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2):38—42.
- [21]方龄贵. 罽罽考述[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5):56.
- [22]韩儒林. 穹庐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45-253.
- [23]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208.
- [24]赵丰. 蒙元胸背及其源流[C]//赵丰,尚刚. 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香港:艺纱堂出版社,2005:143-158.
- [25]陈衍. 元诗纪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87:393. 608.
- [26]唐圭璋. 全金元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016.
- [27]扬之水. “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C]//赵丰,尚刚. 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香港:艺纱堂出版社,2005:120—131.
- [28]欧阳琦. 元代服装小考[J]. 装饰,2006,(8):28—29.
- [29]格日勒图. 蒙古族传统图形及审美特征[J]. 华侨大学学报,2005,(2):127—132.
- [30]赵丰. 蒙元龙袍的类型及地位[J]. 文物,2006,(8):85-96.
- [31]金琳. 云肩在蒙元服饰中的运用[J].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3):12—17.
- [32]贾玺增. 罽罽冠形制特征及演变考[C]//赵丰,尚刚. 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香港:艺纱堂出版社,2005:210—225.

[责任编辑 谷文双]

Research on Mongolian Raiment of Mengyuan Empire

SU Ri-na

(Periodical Department,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81, China)

Abstract: Mengyuan Empire refers to the Mongolian times from Genghis khan to Hubilie, who founded Yuan Dynasty. The Raiment of Mengyuan integrated diversified cultures including nomadism, central areas and middle Asia; therefore it is valuabl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The autho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its Raiment from the period of 1990s to 21 century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Raiment of Mengyuan; diversified cultures; summarize and research